让文化精神在根脉传承中凸显价值

——评《察哈尔史》

◎玉兰

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视地方志、撰写部族史已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和新文化建构的一股热流。这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寻根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特别是随着民族文化强区建设高潮的掀起和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实施，各地、各级政府、学术界和民间学者，共同致力于蒙古族部落、部族历史文化研究，编写和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成绩显著。而这不但具有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同时对民众而言，还有树立自身文化意象和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积极意义。摆在我们面前的这3卷厚重的《察哈尔史》正是这样一部彰扬察哈尔文化精神的力作。

下面，从内容、编写策略和价值建构3个方面对这部著作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可靠而翔实的史料使内容更加丰满

在编纂地方志或史书工作中，搜集资料是准确掌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历史意蕴的基础。从《察哈尔史》所写内容和第3卷后附的参考书目录，我们能够看出编撰人员通过查阅海量的档案、文献、报刊资料和学术资料，为书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而这个过程就是对重要史实、事件进行考证、分析、判断的过程，也是一个探寻真理、学术升华的过程。

在这种整体掌控的基础上，作为部族史的《察哈尔史》，第一卷从察哈尔称谓的由来和含义入手，叙述了这个部族的起源、形成、从繁荣到衰微的历史状貌，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的境遇、使命和命运；第二卷收录了与察哈尔部族生活、生产方式等息息相关的环境地理、生产经济、文化习俗等内容，充分展示了察哈尔文化在草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第三卷是历代察哈尔人物志，用人物事迹和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来彰显察哈尔部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丰功伟绩，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这3卷本严格按照地方志史体例，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用简洁而明快的语言，全面、详细地记载了察哈尔部族的历史、文化和名人。

精当而务实的编写使叙述更加流畅

一般的史书，大部分都按着通史叙述方式，结合断代史和专史编写策略撰写而成。而《察哈尔史》除了这种一般书写所具有的特征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编写策略和修史智慧。这首先体现在它的叙述单位的选定上。

《察哈尔史》是一部部族史。很显然，编写者们把它放在民族史的范围内，又没有超越国家史的范畴。有专家认为，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来看，国家的历史是由众多民族和地方历史所组成的；而一个民族（或部族）、一个地方的历史发展规律，是被国家的发展规律所制约着；另外，各个民族或部落、地方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国家的一般规律在各个民族或地方也有自己的特殊表现形式。因此，这部书选定的“部族史”这一范围，本身包容了多层次的理念。首先，它跨越了由政治体制所形成的行政区划，从而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定。其次，它跨越了不同朝代、不同时代，充分彰显了蒙古民族从历史深处走来，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光明未来的历史规律。所以，虽然地理空间和历史时间的跨度很大，但是编撰者始终紧紧遵循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生动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这种纵横相间的历史叙述，有利于全方位地展现察哈尔这一具有700年历史沿革的游牧部落的历史轨迹，也有利于让读者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规律。

此外，编者的智慧还体现在叙述姿态和资料的处理上。

众所周知，历史是既往的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回溯历史的史书则完全是一种叙述的结果，其中不仅仅只有客观性，同时必然有编著者的主观性、甚至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当下性。因为，它需要的不仅仅是罗列史料，而且必须有正确的立场，独到的观点加以科学的分析评说，才能发挥它资治、存史、教化、交流的功能，才能给人以有益的引导和启迪，使读者从这种既往的存在中领悟到历史的真谛。从这部书的资料处理、人物筛选和编写策略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编撰人员始终不移的学术追求，这种追求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正义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一致。有了这种鲜明的立场，意味着准确把握历史主线就将成为必然。之后，在具体叙述上，以宏观把握和微观处理相结合的方法，遵循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重点放在梳理察哈尔部较为完整的沿革脉络上，同时，努力澄清和重新阐释察哈尔历史上存在争议的事件和人物，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也正是提升著作本身的独创性、学术性和科学性的过程。编著者因格外注重“用观点加史料”的方式来阐释历史、反映历史，所以本书比较完整而清楚地交代了历史事实及其演变过程。我们在这3卷本中阅读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部族历史，而是整个蒙古民族本身。

身份建构使文化价值得到升华

为地方、为民族、为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写专史是一件目的性很强的文化活动。而这种目的是一种集体收益性的目的，所以它集中体现在著作的价值建构上。

在阅读中，我们时刻能够感受到察哈尔部族在蒙古族历史上的独特作用和影响力。察哈尔不是蒙古族最古老的部落，但他们的历史与整个蒙元帝国的历史密不可分。难怪编写者们自豪地说，察哈尔史就是一部浓缩了的蒙元史。他们始终在用史料来证明和强调着察哈尔部的特殊地位，强调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当我们从书中一再读到察哈尔是“居于蒙古社会的中心”“大汗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军万户的中坚”“蒙古正统的象征”，以及“中央部落”“中央万户”“特殊部落”等充满豪情的话语时，我们也就领悟到了编著者给察哈尔部作历史定位的指向性。当我们从书中一再读到察哈尔文化、礼仪、服饰与宫廷音乐、宫廷礼仪、宫廷服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感到这其实是一种话语方式，而这种话语方式不仅在表达察哈尔人的豪迈，更是在提炼蒙古文化的精华。编著者对蒙古文化高贵、典雅、庄重的风格和特征的充分肯定，其实就是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有力重塑。纯净优美的察哈尔方言、经典而简约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独立性极强文武兼备的精神品格，无一不在描摹一种令人神往的察哈尔文化意象。从这里我们能看出，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其实就是个构建自己文化身份的过程。《察哈尔史》的问世，标榜了察哈尔文化身份，标榜了察哈尔部在蒙古历史上的特殊功绩，察哈尔文化是蒙古族文化当中，乃至整个北方草原文化交响乐当中的一部华美、绚烂、动人心扉的乐章。

如此的身份定位，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提升民族认同感。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实质，它不只是传承本族群的传统历史文化，它还会变成一种凝聚力，给包括这一群体的整个民族建立新的发展观和价值观，让民族成员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勇往直前，跃上更高的发展阶段。

这套书的价值当然不在于面向部族内部，焕发起他们的文化自豪感，而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文化是一种软实力，这样的一部史书，有助于促进地域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相互交流，进而强化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这当然是强大的软实力。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本书的编写已经超越了历史叙事本身，我相信，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发挥它新的作用，服务于社会，为我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除此之外，这部书对蒙古历史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线索，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必将对相关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恕不赘述。

《察哈尔史》是一部集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精品之作，而它的成功和价值不只限于该书的编撰上，更体现在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上，应该说这是一部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向本书的全体编撰人员表示由衷的敬意，同时也要向创造察哈尔历史文化的一代代先辈表示缅怀和敬意，是所有这些人奉献给我们这部能够“用历史开创智慧的未来”的一部好书。

典評

本刊宗旨 WENYIPINGLUN

◎聚焦文学艺术界热点话题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追踪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到呼伦贝尔“聆听草原”

◎周其伦

内蒙古作家艾平的新作《聆听草原》，以辽阔壮美的呼伦贝尔为宏大背景，架构宽广深厚，语言沉稳朴素，情深义重地展现出这片神奇大地上天的蔚蓝、河的清幽、草的妩媚，生动鲜活地讲述着万千生灵间的情感沟联。

艾平是一位特别擅长描写蒙古族民俗风情的女作家，她的散文作品屡屡见诸于国内的核心文学期刊。当她的新作《聆听草原》到我手里时，刚好有一次畅游东北白山黑水以及呼伦贝尔的机会，当我一边揣摩着书的厚重，一边浏览着呼伦贝尔的辽阔，那大草原上包括牧马人的豪放、马头琴的悠扬、长调声的婉转等诸多元素，无一不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一幅坦荡无垠的博大画卷，许多摄人魂魄的东西，勾起了我对艾平落笔处一往情深的向往。

作者在《聆听草原》里的运笔知性而温婉，文脉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整体命意下徐徐舒展。既有一个宏阔的人生意境，又像一曲曲恣意纵横的清徐乐章，叙述角度的切换自如，叙述主体的深入浅出，且书且议中的包容大度，充分显示了艾平的浪漫气质和女性心迹。她在描写与牧民相依为命的马、牛、羊和蛰居在这里的万千生灵时，情感的细腻和笔触的曼妙，都使得我们的阅读非常舒适惬意。尤其是她对人文情怀的精雕细琢，更是深情款款的精巧呈现，其中的不少篇章我都在文学期刊上读过。我在《人民文学》上阅读《呼伦贝尔，风景的深度》，在《北京文学》上阅读《守候黑嘴松鸡的爱情》时，心中的感动非常强烈。还有如《我是骑海骝马的巴特尔》和《呼伦贝尔之殇》等篇章，直抵人心。作者在全书的谋篇布局上独具匠心，按“草原、生灵、记忆、后记”等单元进行着蒙太奇式的铺排，每一篇作品既是全书的一部分，又分别充满着灵动而又清新气息。作者从不同的季节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画面中，细腻地展示了呼伦贝尔天地的高远与民俗的流变，深思熟虑中浸透着满满的爱意，文字亲和朴实，催人泪下。文本之间的巧妙串接，像极了大自然随手撒落在大草原上的一粒粒璀璨珍珠，既相互映衬又各自闪烁，每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小故事，共同承载起整部作品的环环相扣与大气恢弘。

作者在草原的无边无际上做足了文章，在《呼伦贝尔之殇》中，作者感人肺腑地以《姥爷的山》《姥爷的马》亮出散文本身的高贵质地，一直写到《姥爷的草原》《姥爷的死》，完成了整整一个纯情雅趣的“姥爷序列”，让人们感受到作者与姥爷之间那份呼之欲出的真挚情感。文章的结尾那段话让我特别感慨：“人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应当像骨瘦毛长的老狼，去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不慌不忙地等待长生天叫你的名字。”

我特别看重作者对草原情态观察的细腻与真切，往往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她所热情讴歌的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等深邃意旨活脱脱地跃然纸上，让人不由得浮想联翩、唏嘘不已。比如《我是骑海骝马的巴特尔》，她饱含深情地写出了蒙古人对马的那种最为真挚最为可贵的情感，细微处以意情牵，折射出普通牧民在多民族大家庭里，生活上一天天发生着的巨大改观，同时也表达着牧民与马的殷殷深情。

艾平带我们到呼伦贝尔去“聆听草原”，同时也袒露出她对这块土地的深深眷念。她告诉我：这种眷恋不止于舌尖上的鲜美，不止于风景的辽阔，不止于最新鲜的空气，甚至都不能用“故乡情”三个字去简单概括，个中的体味，恐怕就只有靠读者自己体悟了。

藝覺

“著作等身”虚胖要不得

◎丰悦

近日，一位在业界和网络上颇受关注的诗人出版新作并接受媒体采访，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出一本书时，她坦言自己是“刻意保持慢的速度”。

“我特别反感一年出几本书的作者，我觉得他们不仅在消耗自己，也在消耗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在浪费纸张。我非常喜欢的诗人说过一句话，他说著作等身的人是很可耻的，我为了慢一点做可耻的人，所以把这个书推迟两年才出版。”诗人此言有极端之处，但其言外的警醒之意让笔者深受触动。

在多数人的传统观念里，对于著作等身者往往不乏顶礼膜拜之情，视之为文化上的成功典范。不可否认，不同的人禀赋殊异，勤奋程度有别，确实有人以其等身之作，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不朽贡献，也确实有著作等身、名副其实的大家成为令人仰望的文化高峰。然而这样的人终属少数，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倘能出版一两本堪称经典之作，已属不易。

在过去，受种种主客观条件限制，写书不易，出书更难。现在科技发达了，物质、文化条件改善了，著作等身越来越不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一个人只要乐意舞文弄墨，只要想将自己的文字公之于世，打开电脑“噼里啪啦”一番，花不了多大力气，大作便可堂而皇之地摆进书店的显著位置，甚或可在网上名噪一时。尤其匪夷所思的是，其中不少著述者，创作精力似乎从未显露枯竭迹象，新作面世如有神助绵绵不绝。

或许，著述者勤于笔耕的劲头值得称道，可其等身之作是否真的就字字珠玑，每一页中是否皆闪烁着真知灼见，恐怕要打个问号。事实上，如若留意不难发现，当今一些作者的系列作品中，不乏拾人牙慧，不乏自我重复，不乏浅陋之见，不乏错谬疏漏……这些作品往往多的是急功近利，少的是厚积薄发；多的是“春梦了无痕”，少的是“润物细无声”。

前不久曾有媒体披露，我国早已跻身于出版大国行列，新书出版速度突飞猛进，出版物总量蔚为壮观，可与之如影随形的是，图书滞销问题亦愈演愈烈，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图书品种年销售数量不足5本，接近一半的图书品种年销售数量小于10本。这些滞销图书要么堆在仓库里落灰，要么重返造纸厂化为纸浆。有鉴于此，不能不说这位“刻意慢下来”的诗人一语中的，忙不迭地出版著述不仅在消耗作者自己，也是在消耗社会资源，在浪费纸张。

“著作等身的人是很可耻的”，有些刺耳，不过目前确有必要引起一些人的警醒，也值得许多著述者将之记在心头，时时咂摸品味，以此适度按捺一下自己狂热的出书躁动。这句话其实也在提醒出版机构，诚应潜心思考，是本着宁缺毋滥原则致力于发现、打磨出版物精品，还是有求必应热衷于造就虚胖的著作等身者？是爱惜羽毛不断擦亮自身品牌，还是急功近利甘愿书香让位于铜臭？

这个时代不缺书，缺的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后的眼前一亮。文学大师马尔克斯谈及自己的读书感受时曾说：“只有百读不厌的书才值得去读。”作为操持文字者，是宁可出一本薄薄的书让人“百读不厌”，还是把著作等身当作终极目标，惟求“看起来很美”，对此，确当好好掂量掂量。

立場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